

析論組織俗民誌的 意義、概念、方法與實例

楊正誠（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組織俗民誌是加拿大女性社會學家 Dorothy E. Smith 所發展的一種研究方法，試圖從個人的每日生活世界與經驗出發，分析、理解並說明人類世界中的社會現象，廣受社會科學界的認可與運用，有其重要性。因此，本文首先介紹 Smith 女性主義社會學的意義與貢獻；其次，針對組織俗民誌的意義、概念與方法進行介紹；最後，以 *Mothering for schooling*（母職與學校教育）一書，作為分析組織俗民誌的研究實例。

關鍵詞： Dorothy E. Smith、女性主義社會學、組織俗民誌
收稿日期： 94.7.15；**定稿日期：** 94.11.22

一、緒 論

組織俗民誌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¹ 是加拿大社會學者 Dorothy E. Smith 所發展的一種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稱之為「女性主義的研究策略」。Smith 出生於 1930 年代，現年七十八歲，於西元 2000 年從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退休，享有國際盛名。其研究領域以女性主義為主，是多所大學的榮譽講座教授，並獲得美國社會學學會的「終身傑出學術貢獻獎」(Career of Distinguished Scholarship Award)，可見其卓越的學術成就。

除了投入學術，Smith 長期從事婦女運動，也非常關心社會改革。在 1970 年代的婦女運動中，Smith 了解到，只有將女性的自我

致謝辭：本文得以完成，要特別感謝中正大學李奉儒、洪志成、卯靜儒三位教授的悉心指導和啟迪，以及萃婷、俞余、美慧、靜宜、祐彰、彥君的共同討論。此外，也要特別感謝高雄師範大學游美惠教授慷慨借閱參考書籍。最後，兩位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寶貴意見、啟發及鼓勵，使我獲益良多，在此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 1 Ethnography 一詞在臺灣有許多譯稱，例如：「人種誌」、「民族誌」或「俗民誌」。就方法論的定義，Ethnography 指的是「一種特殊的研究程序，研究者密切地觀察、記錄，並且參與另外一種文化的日常生活。使用田野工作的方法，描述並說明群體的文化，著重於細節性的描述 (Marcus & Fischer, 1986: 18)」，也是「研究自然發生情境或田野當中人類的研究方法。透過這樣的研究方法，能夠捕捉人類的社會意義與原始活動，研究者直接參與在情境中，用一種系統性的態度收集資料 (Brewer, 2000: 10)」。換言之，Ethnography 所要研究的可以是某一人類群體的文化，亦能夠是某一自然情境中的人類社會活動。過去的人類學界普遍使用 Ethnography 作為研究方法，探究某一人種或族群的文化，因此將之譯作「人種誌」或「民族誌」。然而，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所要描述的，應當是一種多元文化社會當中的編制作用，這樣的編制作用可能是跨種族、跨群體的。因此，作者以為將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譯作「組織俗民誌」較能夠貼近 Dorothy E. Smith 的原意，但與目前臺灣的其他譯稱，例如「組織民族誌」或「建制民族誌」，並無意義上的差異。

經驗轉為了解世界的基礎，方能改變已有的男性主流（male-stream）學術研究。事實上，過去的男性主流社會學論述，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人們所接受的知識範疇，交互連結於日常生活世界中，成為人們思考與想像的工具。因此，Smith 所提倡的社會學女性運動，認為應當認可女性的日常生活經驗，這是由於過去社會學所宣稱的客觀，實際上是從論述中排除了女性的關懷與經驗。透過女性每日生活世界的經驗來重新探究社會，是 Smith 認為批判社會學論述必需的要件（Smith, 1990a: 11-28）。

Smith 融綜各家學派，加上自身的創見，提出「組織俗民誌」的研究方法，廣受社會科學界的運用與認可。組織俗民誌是一個可以應用在多元領域的知識建構理論，可惜的是，目前台灣鮮少有相關研究採用組織俗民誌作為研究方法進行研究，也幾乎沒有相關的文獻探討組織俗民誌的方法論，因此，探討並分析組織俗民誌的意義、概念與方法有其重要性。

此外，由於 Smith 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女性主體知識生產的認識論，開創了「女性主義社會學」的新理論架構，若能夠在探討組織俗民誌之前，介紹其所發展的女性主義社會學的意義與貢獻，將有助於了解組織俗民誌的方法論及其脈絡。

因此，本文首先介紹 Smith 女性主義社會學的意義與貢獻；次及組織俗民誌的意義、概念與方法；最後，以 *Mothering for schooling*（母職與學校教育，2005）一書，作為分析組織俗民誌的研究實例。

二、Smith 的女性主義社會學：意義與貢獻

近二十年來，女性主義學者受到婦女運動、人文社會學術發展等

現象的啟發，提出一些問題，對於社會學理論而言十分重要，在認識論、社會學、知識政治幾方面，尤其深刻。女性主義學者認為性別問題的核心應當在於社會性編制當中的社會關係，而非簡單的生物、自然、功能等區別，性別問題是在社會與歷史的建構之下，產生的巨大差異（Laslett & Thorne, 1992: 60）。

事實上，社會學者在許多的社會學研究領域當中，均十分認可女性主義學者的貢獻。然而，在社會學理論與女性主義理論之間，仍然存在著隔閡。女性主義學者一直不斷努力重新詮釋其與社會學理論之間的關係，特別是：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心理分析、批判理論，以及後結構主義。然而，社會學理論卻忽略了女性主義理論的存在（Laslett & Thorne, 1992: 60）。

Smith（2002: 17）曾經談到，1970年代的婦女運動使其意識到女性經驗可以作為理解世界的基礎，從女性的「立足點」（standpoint）開始進行研究，便能夠重新詮釋社會學論述當中所描述的客體化社會關係，並呈現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不同風貌。Smith（2002: 18）認為，過去的社會學研究，均使用一種男性中心的觀點，來排除女性聲音的存在，而對於社會學產生反思的女性主義思潮與婦女運動，也在很緩慢的過程中，才逐漸體會傳統社會學研究排除了女性的感受與經驗。因此，Smith（2002: 18）提出，必須重新探索社會，採取每日生活世界的經驗作為立足點，批判社會學理論與研究中的論述。

Smith的洞見幫助我們了解並開始探究、發現與彌補女性經驗在傳統社會學理論與研究中所遭受的忽略與扭曲。以下將進一步探討Smith對於傳統社會學理論的批判及其女性主義社會學的貢獻。

（一）Smith 對於傳統社會學理論的批判

Smith 認為，在傳統的社會學理論中，女性受到思考形式、意象及符碼的排除。她認為，傳統的社會學理論就像是男性所建構的圈子，是一種只有男性能夠敘寫的圈子。男性所建構的理論，皆與男性相關；男性所書寫的，也皆與男性相關，這也是建構社會學的過程（Smith, 1987: 18）。

在結構主義盛行之時，社會學者的目標在於發展科學的理論，試圖去解釋一個明顯的客觀真實。所謂社會學理論的核心圈（inner circle），所展現的是一個安全的區域，參與者不需要反思。因此，社會學理論家可以得到高度的自信，因為他身處理論的核心，而其他處於理論邊緣的學者，則是不斷地努力維持外部圈（outer circle）的疆界（Collins, 1992: 73）。

自後結構主義發展以來，實證主義的社會學者對於社會真實的詮釋，受到了有色人種、女性、同性戀以及其他邊緣群體的挑戰；對於這些人而言，傳統社會學是被高度同質的專家學者們所建構，呈現出的是一種探討社會關係的局部觀點。然而，即便社會學曾經受到上述觀點的挑戰，社會學理論的核心圈，其成員、認識論、以及理論架構，仍舊尚未被觸及與質疑（Collins, 1992: 73）。

Smith 在二十餘年的研究生涯中，不斷挑戰主流白人男性所組成的社會學核心圈，無論是社會學理論建構的方式，或是核心圈所生產的社會學理論，均曾受到 Smith 的挑戰。Smith 的作品可以區分為兩種取向，其一是，探究客體化知識中的社會性編制，以呈現這樣的知識如何被建構，如何形成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統治、被統治關係。其次，經由女性的立足點來挑戰既有的男性中心知識，目的在於發展

出一種將每日生活世界中的經驗問題化作為探究核心的社會學。Smith 的目標在於發展出為了女性而存在的社會學（sociology for women），而非關於女性的社會學（sociology about women）（Collins, 1992: 73-74）。

Smith 並不視社會學為一種科學，而視為一種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統治權力關係中的元素。Smith 所提出的觀點，能夠引領人們去思考：是誰處於社會學的核心圈？是誰的利益能夠在核心圈所建構的理論中被呈現？（Collins, 1992: 74）

（二）Smith 對於女性主義社會學的貢獻

Smith 的作品，對於女性主義社會學的建構有重大貢獻。首先，Smith 的女性主義社會學的知識建構方法，是同時將研究奠基於社會學理論，卻又拒絕擁抱任何理論，呈現出一種複雜的研究程序，一方面與社會學理論產生最佳的對話，進一步又質疑社會學理論的傳統主張。其次，Smith 的女性主義社會學，同時連結了社會學的客觀性及建構性，亦即整合了鉅觀的社會學取向及微觀的社會學取向。第三，Smith 的女性主義社會學呈現出超越傳統社會學的價值，亦即作為一種重新賦予社會學論述生命的方式。例如：Smith 經由女性主義對於女性獨特經驗的重視，識別出社會學研究的新起點，亦即扎根於人類真實經驗的理論，而非建構於社會學傳統的意識形態結構。第四，Smith 幫助我們了解知識的建構過程，及其後續在社會中的運作、如何產生宰制的效果。Smith 對於社會學作為增強統治關係的角色，有廣泛的分析，並認為傳統社會學的思考與書寫將人們的主體經驗，轉換為客體化的知識，這樣的社會學理論與論述忽略了真實經驗的重要

性，文本與社會學式的寫作，成為一種從主流群體出發的社會現象知識的建構，類似於一種手工製品。第五，Smith 嘗試修補以往社會學作品中理論與實證研究之間的鴻溝，其所發展出的二元主題式研究，一方面探討知識如何產生統治關係，另一方面建立為女性而存在的社會學，不僅進行理論性的探究，同時透過實證性的工作進行探討，闡明了一種選擇性的知識社會學（Collins, 1992: 74-77）。

綜而言之，Smith 的女性主義社會學提供了社會學研究的新起點，同時也識別了長期以來社會學研究的問題（Collins, 1992: 77）。

三、組織俗民誌的意義

組織俗民誌主要的探究對象為當代的統治形式（forms of ruling）。組織俗民誌與其他的俗民誌研究方法的相似之處在於，皆關注於社會現象，致力於對社會現象的細微分析與描述（Mykhalovskiy & McCoy, 2002）。然而，與其他俗民誌研究方法的不同之處在於，組織俗民誌並非將焦點專注於實證性的經驗與文化探究，組織俗民誌描述的是一種社會性編制中的運作程序（Mykhalovskiy & McCoy, 2002），專注於探索並描述各種不同的社會、編制性力量，那一種形成、限制、重組人們日常生活世界的真實生活的力量（Mykhalovskiy & McCoy, 2002）。

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組織俗民誌可說是 1960 年代到 1970 年代初期，北美婦女運動之後，Smith 對於社會學理論產生反思後的產物。組織俗民誌來自於女性的日常生活經驗與當代主流文化、意識形態之間的斷裂（Smith, 1987）。這樣的思考源頭，是由於 Smith 身兼家庭及學術工作的雙重身分，在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編制場域中，

Smith 覺察到，在不同的日常生活場域中，女性所受到的編制與被編制的知覺是截然不同的。Smith 提到，對於家庭工作的知覺，就像是一種關注在地生活與關係的感受，所關注的事物為家事、小孩、鄰居等。而在學術工作當中的知覺，則受到了特殊論述的影響，這樣的影響透過了文本的傳遞，能夠超越不同在地生活與關係，連結自我與其他社會性編制當中的他人。Smith 便是經由家庭工作與學術工作的知覺對比，覺察到統治關係（ruling relation）的存在。

組織俗民誌的重要特色便在於批判客體化人們生活經驗的統治關係。也因此，組織俗民誌的探究並不因循於傳統社會學論述的脈絡，並且將研究開始於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尋求並探究這些日常生活經驗如何與其他的活動程序進行協調（Mykhalovskiy & McCoy, 2002）。透過對於個人日常生活中行為的關注，那些聽到的、讀到的、觀察到的每一天的生活經驗，建構了組織俗民誌的研究資料特殊性，探究了人們是如何在不知不覺的過程中，陷入統治關係（Campbell, 1998: 57）。

組織俗民誌與傳統社會學研究尋求理論的建構不同，組織俗民誌探究那些「真實發生的現象」，那些在實踐與關係中發生的實際。組織俗民誌將日常生活經驗視為一種實用性的知識，透過分析日常生活經驗而能夠了解人類的經驗與困惑，彼此之間如何地產生社會性、編制性的連結（Mykhalovskiy & McCoy, 2002）。

因此，從人類日常生活中的議題與問題開始，進而經由人類經驗及日常生活中展開探究，並建構理論的研究方法，便稱為「組織俗民誌」。組織俗民誌並不將研究的視角侷限於在地社會組織或人類生活經驗的描述，而是將每日生活世界視為問題化的開始，作為探究的來源。研究者的工作在於找出人類活動在社會關係及多元在地場域中的

位置，以使人們進一步開始了解自己所未能覺察的生活及工作內容（Smith, 2002）。

人類無法自我了解或自我解釋，除非熟知關於自我的知識。因此，組織俗民誌便是經由人類的經驗，來發覺經驗當中所難以掌握的部分，亦即在社會性編制當中隱而未現的社會關係（Smith, 2002）。

四、組織俗民誌的相關概念

由於在組織俗民誌的理論與方法中，許多重要概念具有特殊性，且與過去既有的理論與方法具有差異，或由 Smith 與相關社會學理論進行對話互動，進而轉化而成，或由 Smith 個人所獨創。因此，以下將針對組織俗民誌的重要概念進行說明，這些重要概念包含了：組織、論述、經驗、統治關係、社會關係、文本、工作，以釐清組織俗民誌重要概念的意涵與關係。

（一）組織（Institution）

組織俗民誌中的組織一詞，有時會讓人誤解。組織俗民誌中的組織，所指的並非一個具有疆界的空間，例如：醫院、學校。組織所指的是一種複雜的統治關係（ruling relation），是一種個人的、機構的、專業團體的多元活動，以及在活動過程中所產生並傳播的論述，這樣的過程與論述會集結成特殊的功能，例如：學校教育活動（Smith, 1987）。組織是一種穿梭並超越日常生活經驗的在地情境的關係，並不是科層理論當中的組織概念，亦非一種社會機構的形式，而是一種統治的多元關係的交錯與協調（Smith, 2002）。

組織俗民誌的目的便是在於探究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與這樣的組織如何連接關係（Mykhalovskiy & McCoy, 2002）。組織俗民誌的研究者的目標，便是要探究人們在特殊的在地情境中發生了什麼？並且探究人們如何透過活動與工作實踐，與組織進行協調與重構（Smith, 2002）。

（二）論述（Discourse）

Smith 對於「論述」的使用，起源於 Michel Foucault 在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知識的考掘，1972）一書與 *The order of discourse*（論述的秩序，1981）一文中的見解。Smith 對於論述的概念，保留了 Foucault 在 *The order of discourse* 中的概念，但又脫離了 Foucault 對於論述的詮釋，從一種女性主義的觀點切入（Smith, 2002: 41）。

Marjorie DeVault 與 Liza McCoy（2002: 772）曾經對於 Smith 的論述觀點以及 Foucault 的論述觀點進行比較與區辨。他們認為，組織俗民誌分享了 Foucault 對於文本、權力、治理的興趣，然而，卻也有一些核心的差異，特別是在進行組織俗民誌的過程中，必須要注意這些差異的部分。在 Foucault 的作品中，論述的觀點表明的是一種大規模的對話，穿梭於文本之中。而 Smith 所探討的論述，指涉的是一種關係的場域，不僅包含了文本以及文本之間的對話，同時包含了人們在真實場域當中的活動，那些製造文本、使用文本，並且傳播概念的架構。這樣的論述觀點，將使研究者在處理文本（包含互動與對話所產生的權力關係）的過程中，不致忽略了主體的存在。

因此，Smith 要傳達的是，當人們活動於每日的日常生活世界

中，實際上便參與在論述當中（Campbell & Gregor, 2004: 41）。因此，Foucault（1984）所概念化的知識／權力關係，對於 Smith 而言，就像是一種社會關係，代表的是人們在知識的理解與行動當中的真實參與。Smith 的觀點是，人們在參與活動的過程當中，會受到知識與事物運作邏輯的影響，同時也會貢獻出對於知識的詮釋，這樣的程序代表的便是人們參與了統治概念的建構。因此，統治通常發生於人們查閱主流的、宰制的論述，並且根據對於論述的了解，產生行動（Campbell & Gregor, 2004: 41）。

對 Smith 而言，論述不僅作用於實踐之上，同時也是每一個體的獨一無二實踐，作用於每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世界所感受到的經驗。事實上，每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均會透過論述進行實踐的協調，這樣的協調過程特別容易發生在人們與他人說明工作、描述自我是如何完成工作的時候。所以，論述的權力作用，便像是經過編制後的社會關係，論述的秩序便像是社會關係的具體組織，存在於人們的活動之中。

Smith 認為，組織俗民誌中的論述，本質上是在地化的，存在於在地的時間與空間當中。而論述的具體化過程，便是人們在生活的在地場域中，經由不斷的生產、再生產而具體化（Smith, 2002: 41）。所以組織俗民誌所要收集的資料，便是那些透過人們敘說、言談、書寫等活動所產生的論述，並藉由這些論述，揭露獨特在地社會情境中的統治關係。

（三）經驗（Experience）

相較於其他社會學理論對於經驗的主觀性批判，組織俗民誌並不

輕忽那些人們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習以為常的事物。相反的，個人的經驗變成是一種基礎，經由經驗可以探索社會的關係和編制，並進一步超越、連結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換言之，組織俗民誌是透過經驗來探索那些構成人們經驗的社會關係（Griffith & Smith, 2005: 3）。

組織俗民誌所探究的經驗，奠基於 Bakhtin（1986）的言說類型（speech genre）概念。認為人們在特殊活動情境當中所進行的說與寫，能夠描述自我的經驗。經驗並非既定的個人知覺的知識，而是像對話一般，無論透過書寫或言說的方式均能夠獲得。在研究對象敘說自己經驗的同時，其他人可以透過提問，協助其經驗的表達（Smith, 2002: 42-43）。

在組織俗民誌的方法論當中，經驗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概念，因為組織俗民誌關注的是每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世界當中的行為與工作。我們聽到的、讀到的、觀察到的每日生活經驗的概念形構，建構了組織俗民誌的特殊性，並能夠經由經驗來探索人們如何在不知不覺中，陷入統治關係（Campbell, 1998: 57）。

因此，組織俗民誌開始於經驗，回歸到經驗，並使用經驗作為研究資料，以分析、說明人類世界的日常生活與真實（Campbell, 1998: 55）。透過組織俗民誌，研究者得以揭露事件如何在人們的經驗中發生，使用組織俗民誌作為研究方法，將使得人們的工作經驗得以透過自我敘說而清晰說明（Smith, 1987: 178）。

（四）統治關係（Ruling Relation）

統治關係的探究，必須透過研究者對於人類日常生活世界的經驗探究開始，去尋找那些協調人類日常生活經驗的在地活動。統治關係

的產生可能來自科層體制、論述、管理方式、大眾媒體、社會編制等。統治關係的效果是微細的、穿越在地的，植基於多元形式的文本（例如：印刷、電腦、電影、電視等），以及資訊、知識、文化、科學等關係。統治關係以文本、論述的形式作用在人身上。事實上，組織俗民誌探究的核心—組織，便存在於統治關係當中的複雜情境（Smith, 2002: 45）。

（五）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

在組織俗民誌當中，社會關係所指的並非師生、親子等關係，而是人們在特定的在地情境當中，透過行動與經驗，與其他的、多元的在地場域之他人，產生行動程序之連結與協調（Smith, 1990b: 93-96）。因此，在組織俗民誌的研究當中，研究者若能夠從社會關係開始探究問題，便能夠對於日常生活世界當中的論述，產生問題意識。

Smith 認為，透過社會關係，人們的生活受到社會性的編制。社會關係並不侷限於活動當中，它是一種活動的延伸，穿梭於社會情境之間。人們自動地、活動性地建構了社會關係，人們參與在社會關係中，不知不覺地、具知識性地協調著自我與他人的行動，以滿足專業標準、家庭期望或編制規範（Campbell & Gregor, 2004: 31）。

社會關係是一種複雜的實踐過程，能夠協調人們的行動，跨越時間與空間的區隔，使得人們在不知不覺的過程中受到影響。經由社會關係，能夠探究、澄清人類生活的神秘面向。作為一個社會分析者，具有社會關係的概念，便能夠發現、探析每日生活世界中的困惑。社會關係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但是研究者若要了解社會關係，所需要接觸的，是人們日常生活經驗的實在事物（Campbell & Gregor, 2004: 31）。

（六）文本（Text）

組織最令人好奇的力量，便是如何穿越眾多的在地情境，進行人類活動的概括化。Smith 的解釋是，概括化的過程是透過文本進行的，經由標準、複製的文本，能夠調節人類工作的在地情境。文本也能夠使外界的規則直接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世界。文本可以是被閱讀的文字，可以是印刷出來的文字，也可以是電腦軟體的文字，換言之，文本可以透過各種形式來侵入、滲透在地情境（Smith, 2002: 34）。

文本能夠協調在地情境與特殊時間，亦能夠連結人們與外部的社會關係。這樣的協調與連結的作用，是經由人們對於文本的閱讀，以及其他讀者的接續動作產生。閱讀是一種交互作用的歷程，也因此，文本與讀者之間的關係是動態的。此外，文本與面對面對話的差別，便是文本無論被閱讀多少次，內容均不會產生改變。不同情境、時間的讀者，皆可能受到相同文本的規訓（Smith, 2002: 35）。

Smith 在解釋文本的作用時談到，文本是在人們使用它的過程當中被啟動（activate）（Smith, 1999: 148-151）。啟動所描述的是，人們透過與文本之間的對話，產生行動與工作的協調。而這樣的啟動過程，能夠使得文本的統治能力超越場域，協調不同場域的人們的行動（Campbell & Gregor, 2004: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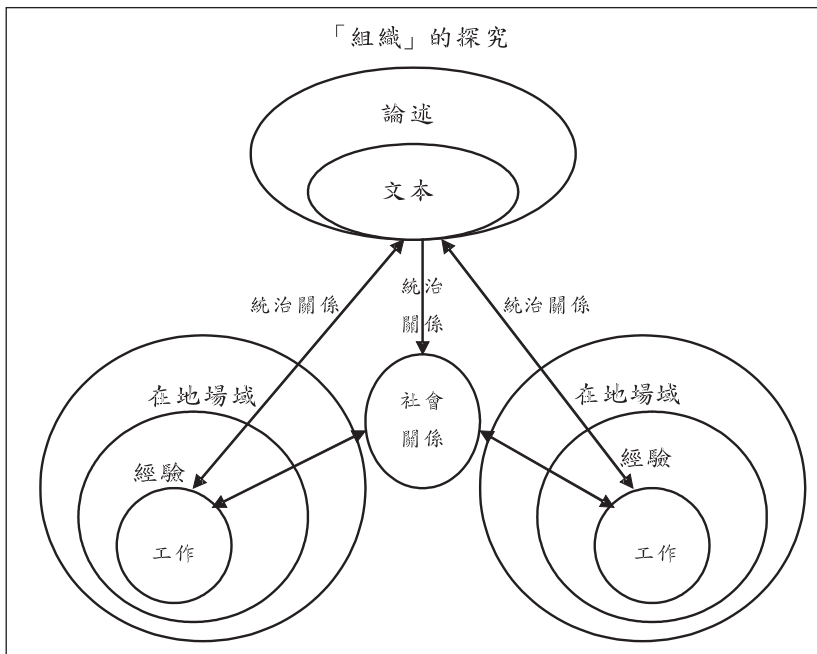
文本與其啟動過程，建構了人們之間的社會關係。如果能夠將這些關係進行連結，便能夠發現事物編制的方式，以及人們被統治的情形。事實上，透過文本的中介，人們的行動被規範化、效益化、責任化，那些文本所記載的活動，例如：健康關懷、社會服務、教育傳遞等活動，均透過文本的論述以及文本的啟動，而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活動（Campbell & Gregor, 2004: 34）。

（七）工作（Work）

組織俗民誌的工作概念與一般的思考不同，組織俗民誌選擇工作作為一種隱喻，因為工作可以視為是人們的行為，是檢視經驗的重要媒介。Smith（1987: 165）對於工作這一概念的詮釋，是來自於對於女性家庭工作的反思，長久以來，女性的家庭工作從未被視為一種工作，但事實上，家庭工作的確影響了經濟脈動。因此，Smith 擴展了工作的概念，認為工作指的是人們付出努力與時間的行動，依賴於特定的資源，受到社會性編制，並與其他人進行協調（Smith, 2002: 46）。換言之，人們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活動與表現，與在地社會關係進行協調的行為與經驗，均被視為工作。這樣的工作概念，相較於以往的概念，差異在於較為具有流動性，並且牽涉到了個人的經驗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結合主體與客體，超脫以往的工作概念與既有的理論架構。

圖一說明了組織俗民誌重要概念之間的關係，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的了解不同概念在組織俗民誌研究方法中的「位置」。在圖一當中，工作代表的是每一個體在不同在地情境當中的活動與經驗，這樣的工作受到了論述藉由文本做為媒介所產生的統治關係的影響。其次，個體與文本、論述之間的互動是雙向的，論述不但作用在個體的身上，個體對於論述文本的閱讀，及所產生的實踐，亦展現了論述的效果。不同在地場域當中的個體，受到論述、文本的統治關係影響所產生的協調與隱而未現的編制效果，便是社會關係。而全圖所呈現的，便是個體在論述、文本、社會關係、統治關係的交互作用之下的「組織」效果。

圖一 組織俗民誌重要概念之間的關係



五、組織俗民誌的研究方法

組織俗民誌的研究方法與傳統的俗民誌研究方法不同，並非專注於觀察的方法與訪談，而是從獨特的個人角度出發，探究、描述並分析複雜的社會現象（Smith, 2002）。組織俗民誌也會透過訪談、觀察與文件收集作為資料來源。但是，組織俗民誌與傳統的俗民誌研究方法的差異在於，不僅將這些資料視為受訪者的經驗來源，並將之視為社會結構與個人能动性互動的產物，因此並不將這些資料視為絕對正

確的主觀詮釋，也不將之視為應被排除的偏見，而視為可資辯證的分析起點。組織俗民誌的研究方法，可以區分為六個研究步驟，分別是：尋找方向、從經驗到組織、實踐中對話、訪談、研究中探索、資料處理（Smith, 2002）。

（一）尋找方向

組織俗民誌開始於一個探究組織秩序的立足點（standpoint），從立足點出發，進行探究。這樣的立足點必須是對於人們而言相當真實的議題、關心的事物或問題，以作為研究者探究的方向（Smith, 2002: 23）。

（二）從經驗到組織

組織俗民誌的研究者在尋找到立足點之後，可以先針對欲以探究的研究對象，進行小規模的訪談，以作為初探性的研究。透過小規模的訪談，所得到的真實經驗及敘說，可以幫助研究者從研究對象的角度進行思考，澄清研究所關注的問題。透過這樣的小規模訪談，研究者得以初步揭開組織秩序的序幕，初步了解研究對象進行工作、協調的場域。

（三）實踐中對話

組織俗民誌開始於個人的訪談，因為組織秩序存在於個人如何的陳述其工作。因此，在研究者決定了探究組織的立足點，並且透過初

步訪談的結果，確認研究的立足點之後，所要進行的便是研究的正式訪談（Smith, 2002: 25-26）。

（四）訪談

在進行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很容易遇到的問題是，受訪者的回答大多是歸納性的論述。即便他們談的是工作的議題，也會轉移到社會性編制當中，使用相關的意識形態語言進行訪談問題的回應。這樣的論述特別的缺乏描述性的內容，同時，這樣的訪談內容對於組織俗民誌而言亦較不具價值性，因為組織俗民誌著重的是日常生活的經驗及敘說，而不是綜合歸納的論述。因此，研究者必須要能夠找出適合的訪談技巧，例如：隨機式的詢問、非傳統式的訪談程序，以獲得描述性之回應（Smith, 2002: 26-27）。

（五）研究中探索

在組織俗民誌的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必須要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訪談，經由和研究對象之間的對話產生學習。換句話說，組織俗民誌認可訪談與觀察中的對話，並且認為研究者應該向研究對象學習，必須積極尋求在研究中的改變，不僅要發現自己所未知的，同時應當使用各種不同的角度來思考研究中的發現。此外，由於組織俗民誌探究的是社會性編制中的統治關係，那些論述實踐的效應，因此思考的轉變點必須集中在，組織是如何受到論述所影響，又如何進行運作（Smith, 2002: 27-28）。

組織俗民誌認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處於相同世界中，可以將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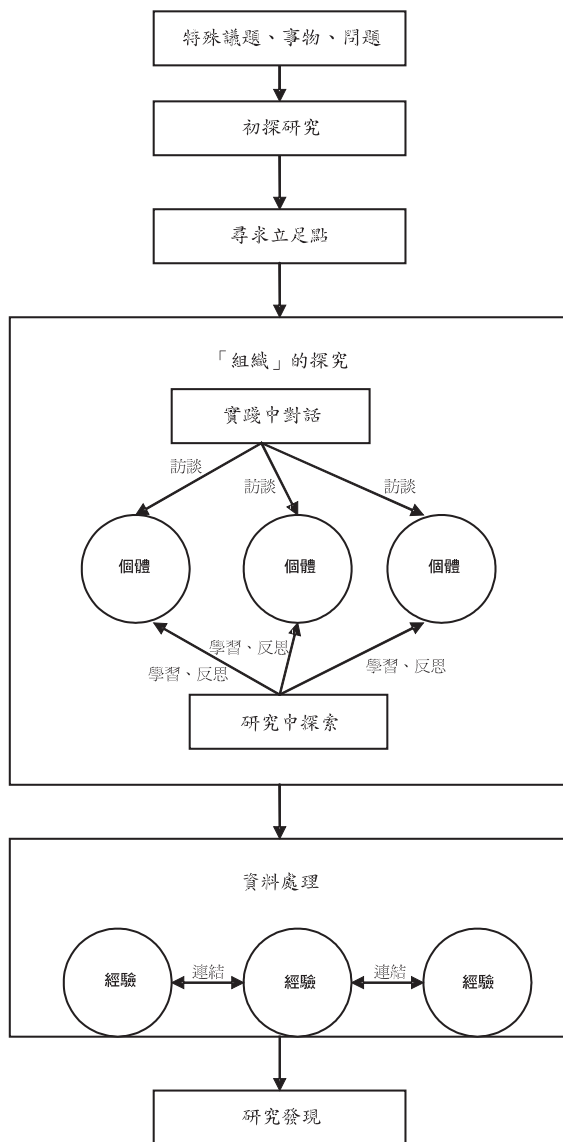
者的自我回應與反思視為開啟組織政體（institutional regime）新面向的契機（Smith, 2002: 28）。組織俗民誌認為研究並無法透過單一的觀點進行全盤性的了解，要探究一個組織政體最好透過多元的觀點切入，多元的探究觀點被視為了解組織政體的視窗（Smith, 2002: 30）。

（六）資料處理

組織俗民誌的資料處理與分析，並不是設定編碼或是類目，而是研究者對於研究對象的工作內容進行訪談，透過獲得的訪談資料，探究人們如何在工作當中協調與他人工作之間的關係，亦即社會關係，探究在地場域的工作如何與其他在地場域的工作產生連結（Smith, 2002: 30-31）。

Smith 認為，組織已然隱含於人們言說及書寫的方式之中，因此，社會關係已經蘊含在人們對於工作的敘說當中（Smith, 2002: 31）。在每一份訪談的逐字稿中，所呈現的很可能是單一個體的工作與經驗，但是我們必須要了解，每一個體的活動與貢獻，皆受到了論述與文本的影響，穿越每一個體的情境與經驗，概括化、標準化了組織的形式與關係。因此，在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的過程，研究者在訪談逐字稿的過程中，應當要找尋的，是人們如何的敘說其工作，以及如何的敘說與他人工作之連結，以發掘那些更大的社會關係，探究那些組織的秩序，亦即，那些巧妙的協調人與人之間的在地實踐的統治關係。以下則以圖二說明組織俗民誌的研究方法與步驟：

圖二 組織俗民誌的研究方法與步驟



六、組織俗民誌的研究實例

經由對於組織俗民誌的意義、概念與方法的討論，雖然呈現出了組織俗民誌的整體輪廓，但是對於實際進行研究的應用，還是顯得頗為抽象，若能夠針對組織俗民誌的實際研究進行剖析，應可更進一步了解組織俗民誌之意涵與方法。A. I. Griffith 與 Smith 在 2005 年出版的 *Mothering for schooling* 一書，便是使用組織俗民誌進行教育研究的精彩實例。接下來，將透過這本書的內容，分析 Griffith 與 Smith 在此一研究中，如何使用組織俗民誌的相關概念與方法。在本小節中，將分為研究背景、研究架構、研究方法、研究發現四個部分進行討論。

（一）研究背景

近年來，美國的公立學校系統，十分倚賴家長對於學校教育的參與及協助，亦即家長對於補充性教育工作的支持。但由於 Griffith 與 Smith 兩人身兼母親與學術工作的雙重角色，使其自覺無法補足孩童的學校教育工作，因而感到自疚，這樣的過程使得 Griffith 與 Smith 不斷地反省母職與學校教育之間的關係，進而發覺到一種新的、複雜的運作程序在成形，亦即母職、家庭與學校之間的複雜關係（Griffith & Smith, 2005: 8）。

在此研究中，Griffith 與 Smith（2005）所要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中產階級的家庭，亦即父親在外專職工作，母親專職負責家庭工作與孩童照護的形式，已成為美國公立教育系統中的典型家庭，是否導致教育機會不均等的再製？」（Griffith & Smith, 2005: 2）

為展現出公立學校系統的轉變，以及其與家庭之間的關係，Griffith 與 Smith 指出，母親的母職工作與孩童的學校教育密切相關，並且會隨著其丈夫的收入差異，而使得母親投注母職工作的時間產生差異。然而，母職投注時間的差異，直接地、間接地影響、形構公立學校系統成為「不平等的機制」（Griffith & Smith, 2005: 8-9）。Griffith 與 Smith 藉由此一研究，揭露過去鮮為人知的母職教育工作與學校教育之間的關係（Griffith & Smith, 2005: 9）。

（二）研究架構

圖三所表示的是此研究的研究架構圖，透過架構圖我們可以清楚得知，此研究的在地場域有二，分別是商業區小學與郊區小學。所獲得的經驗便是以這兩個在地場域的母親經驗為主。關注的工作焦點則是母親的日常工作與補充性教育工作。母職論述則透過專家、書籍的文本作為傳播論述權力的媒介。此研究所欲以分析的「組織政體」便是母職教育工作與學校教育之間的關係，研究目的在於探尋其中所隱含的不均等與再製現象。

（三）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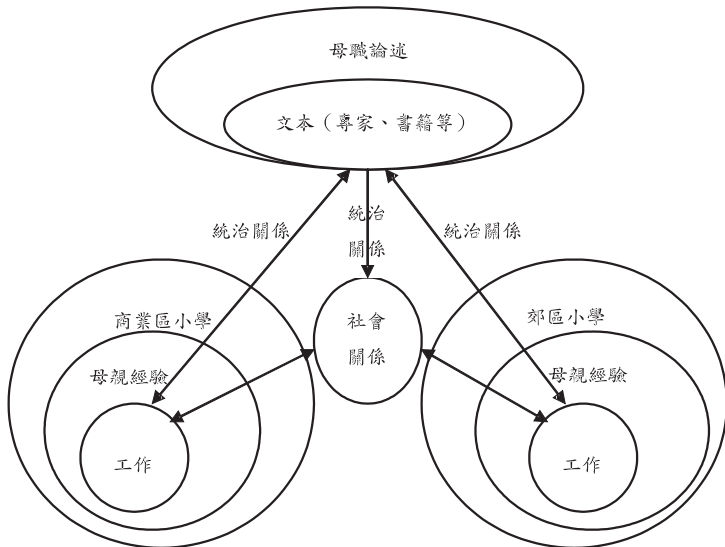
此部分則呈現 Griffith 與 Smith 如何運用組織俗民誌的六項研究方法與步驟進行研究。

1. 尋找方向

在此研究中，Griffith 與 Smith 尋求研究方向的方法，是經由彼

圖三 *Mothering for schooling* 研究架構圖

「組織」的探究（母職教育工作與學校教育的關係）



此身為母親的共同經驗，以及彼此對於研究觀點的相互溝通與分享，進而尋找出研究的方向。由於 Griffith 與 Smith 兩位學者，皆深度關懷母親與學校教育之間的問題。透過彼此之間的相互溝通，分享了信心、抱怨、痛苦、罪惡感，深入理解了彼此分享的社會關係與學校教育。換言之，Griffith 與 Smith 是透過自我經驗的反思，以及與他人之間的溝通，從自我生活世界中的衝突（身為學術工作者無法兼顧孩子的補充性學校教育工作），來找尋社會關係中的問題點（在不同階級的正常家庭中，母親在學校的補充性教育工作角色是否具有差異？是否產生不均等現象？）。因此，Griffith 與 Smith 首先建立了一個獨特的研究立足點，便是關注於有孩子正就讀於小學的母親工作經驗，

以及參與補充性學校教育工作的經驗。

2. 從經驗到組織

於是，Griffith 與 Smith 在研究的初期階段，首先進行的工作，便是針對部分孩子就讀於小學的母親進行初探性訪談，以建立研究者對於母親在社會性編制脈絡中的日常生活經驗的了解。訪談內容可以幫助研究者了解母親的工作經驗，以及與學校教育之間的關係，能夠超越研究者既有的經驗，進一步思考並了解研究的問題。Griffith 與 Smith 透過初探性訪談，發覺問題的焦點在於，母職工作不但會隨著個人因素產生差異，也會隨著不同的社會關係及在地場域產生差異，這樣的差異都是探究組織政體的關鍵（Smith, 2002: 25）。因此，Griffith 與 Smith 決定在正式研究中，訪談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學區的母親，以了解不同階級所可能形成的不均等現象。

3. 實踐中對話

在此研究中，Griffith 與 Smith 一共訪談了十二位母親（六位母親來自商業區，六位母親來自郊區），隨後進一步訪談商業區與郊區小學的教師與行政人員。商業區的小學指的是位在都市中心的學校，大多是由收入較低或社經地位較差的家庭所組成。郊區的小學歷史較為悠久，學校人員配備較多，財政資源亦較佳，教師的專業地位也較高。在郊區，孩童大多數與母親或其他親人一同走路上學，大多數的母親志願擔任班級或辦公室的義工，協助補充性教育工作。家長們大多具有專業化的職業，例如：醫生或律師。

透過初探性的訪談，Griffith 與 Smith 預期能夠從不同在地場域的母親經驗獲得不同的資訊，特別是那些商業區的母親，是如何克服

經濟的困難進行母職的工作。但是，雖然從不同階級的母親經驗所獲得的訊息必然相當多元，且具差異性，但是 Griffith 與 Smith 在研究進行的初期所建立的立足點，關注母職與學校教育之間的關係，並不會因為所獲得的多元訊息而有所改變。

4. 訪談

在組織俗民誌的訪談中，所希望獲得的資料，應當是描述性而非歸納性，因此，Griffith 與 Smith 在研究的過程中，也積極的尋求能夠獲得描述性訪談內容的方法，他們所使用的訪談技巧是，整合學校日程表的時間安排與訪談問題作為訪談架構。例如：早上的時候，妳如何帶妳的小孩去上課呢？他們中午的時候會回來吃午餐嗎？那妳又需要準備什麼呢？晚上的時候，妳如何去接妳的小孩回家呢？換句話說，研究者若能夠儘量的將訪談問題與日常生活經驗進行連結，僅將理論架構作為訪談問題的背後方法論，而非使用複雜的理論語言或專有名詞作為訪談問題，便較為容易獲得描述性的日常生活經驗，而非充滿符碼的歸納性敘說。

5. 研究中探索

在研究中探索階段，研究者就像學習者，從一次又一次的訪談內容中學習，並從不同的角度思考獲得的資訊。Griffith 與 Smith 在訪談的過程中，曾經因為一位全職的母親而感覺不舒服與焦慮，這位受訪者不需要擔負額外的工作時間，給予孩子的照護並非 Griffith 與 Smith 所能達到的。然而，正因為組織俗民誌認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處於相同世界中，Griffith 與 Smith 開始探索自己為何會不安、痛苦與焦慮，從中反省、學習並覺察「母職論述」(mothering discourse)

的存在，母職論述將母親置於一個奉獻的角色，在專家、書籍、知識的導引之下，母親成為必須要為孩童教育發展、人格、社交、整體安康產生負責態度的角色（Smith, 2002: 29）。而這樣的母職論述，是在不知不覺的狀態中影響了母親、教師及學校教育，協調了母親與學校教育工作之間的關係。

6. 資料處理

Griffith 與 Smith 在此研究的資料分析策略為，先將接受訪談的母親區分為全職的母親（每週工作時間少於十個小時）與在職的母親（每週工作時間大於十個小時）。接下來，再依照參與補充性學校教育工作的程度，區分為四個參與補充性學校教育工作的層級，分別是：(1)以教育為優先、(2)多樣化的日常工作、(3)彈性的日常工作以及(4)非強烈的學校教育傾向。他們在資料處理的初步階段區分了母親的不同層級，再進一步分析每一位母親對於參與補充性學校教育工作的敘說，於結果的討論部分，則著重於連結不同階級、不同補充性學校教育工作參與程度的母親經驗，探討其間所呈現的社會關係，所隱含的統治關係，以及組織政體當中存在的問題。

（四）研究發現

Griffith 與 Smith（2005）在此研究中，經由商業區及郊區小學的母親對於母職工作與參與補充性學校教育工作經驗的敘說，來分析其間社會關係的連結，以及其中所隱含的統治關係。在社會關係層面，Griffith 與 Smith（2005）發現的是，商業區小學與郊區小學的母親能夠付出補充性學校教育工作的差距，以及商業區小學的母親在母職工

作與補充性學校教育工作之間的掙扎。進一步發現組織政體的問題在於，美國的公立學校系統已經成為了「不均等的機制」。更進一步的探究其成因，癥結點便在於班級人數的大小，因為班級人數若能夠降低，教師便能夠有更多的時間照護不同需求的孩童，特別是那些成就落後的孩童，那麼母親所提供的補充性學校教育工作的落差便能夠降低，但是班級人數的大小又取決於教育經費的補助，政府對於公立學校系統所提供的補助越低，班級人數的大小便無法降低。然而，在這樣的問題背景之下，學校教育將問題推回給家庭，要求家長花費更多的時間照護孩童，並且與母職論述交織在一起，讓母親產生無比的義務感與未完成時的罪疚感。此研究的分析結果，凸顯了階級差異、教育經費投注、學校教育與母職論述之間的連結，所形成的社會不均等現象，試圖將母親與教師的責任，轉移到教育政策對於教師工作時間的合理分配、教育經費的合理補助以及班級人數大小的合理規劃問題（Griffith & Smith, 2005; Smith, 2002）。

七、結 論

本文透過 Smith 與相關學者對於組織俗民誌方法論的論述、探討及應用，分析組織俗民誌的意義、概念與方法，並經由 Griffith 與 Smith 所撰寫的 *Mothering for schooling* 一書，分析組織俗民誌的研究實例，以了解如何運用組織俗民誌的概念作為研究架構，以及如何使用組織俗民誌的方法與步驟進行研究。組織俗民誌除了能夠從多元位置探究統治關係之外，也能夠進一步的描繪人類經驗、組織、論述之間的關係，更能夠回答「我們能做什麼？」因此，對於學術、政策與改革均具有重要意義。

Smith 所提出的女性主義社會學，以及組織俗民誌研究方法，對於本土化的婦女與性別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意義與啟示。首先，Smith 所提出的，對於傳統社會學理論觀點的問題化，促使我們對於既有的婦女與性別研究理論產生反省性的思考，以西方世界的女性經驗為基礎的婦女與性別研究理論，是否應當毫無反思性地全盤接受，若要建立本土化的理論脈絡與體系，便應與現有的理論進行對話，而不將其視為絕對的真理。研究者可使用組織俗民誌作為研究方法，從本土的女性經驗出發，建立在地化的婦女與性別研究；其次，Smith 所提出的文本、論述與經驗所交織的統治關係，除了讓婦女與性別研究了解並知悉「權力／知識」的力量外，更重要的是，Smith 除了繼承 Foucault 對於文本與論述權力的觀點之外，同時也注意到了文本與論述權力在個人的行動與經驗當中的展現，換句話說，論述與論述實踐的力量均是組織俗民誌所能夠探究的焦點。這樣的觀點提醒了我們，使用後結構的研究方法（例如：論述分析）進行婦女與性別研究，除了能夠分析文本與論述的權力作用外，若能夠透過女性的「立足點」，真實地去分析女性工作的經驗，便能夠進一步覺察女性在工作實踐過程中受到「權力／知識」的規訓效果，以及轉化的可能力量。這樣的研究能夠真正為女性發聲，也是抗拒「權力／知識」的重要力量。

最後，Smith 對於社會學知識論所進行的反思，不但提醒了我們關注女性主體經驗的重要性，更重要的啟示則在於，女性當中也有主流、非主流的差異存在，女性的邊緣群體，例如：外籍配偶、原住民女性，均必須納入婦女與性別研究的關注對象，以避免婦女與性別研究成為再製主流女性經驗的工具。換言之，更加深入的反思個人經驗的多元性與差異性，是 Smith 思想給予研究者的重要啟示。

參考文獻

- Bakhtin, M. M. (1986) *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Brewer, J. D. (2000) *Ethnography*.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Campbell, M. (1998)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nd experience as data. *Qualitative sociology*, 21(1): 55-73.
- Campbell, M., & Gregor, F. (2004) *Mapping social relations: A primer in doing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New York: AltaMira Press.
- Collins, P. H. (1992) Transforming the inner circle: Dorothy Smith's challenge to sociologic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10(1): 73-80.
- DeVault, M., & McCoy, L. (2002)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Using interviews to investigate ruling relations. In J. Gubrium & J. Holstein (Eds.), *Handbook of interview research: Context and method* (pp. 751-776).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Foucault, M. (1972/1971)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A. M. Sheridan-Smith, Tra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1)
- Foucault, M. (1981) The order of discourse. In R. Young (Eds.), *Untying the text: 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 Foucault, M. (1984)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Griffith, A. I., & Smith, D. E. (2005) *Mothering for schooling*. London and New York: Falmer.
- Laslett, B., & Thorne, B. (1992) Considering Dorothy Smith's social theory:

Introduc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10(1): 60-62.

Marcus, G. E., & Fischer, M. M. J.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ykhalovskiy, E., & McCoy, L. (2002) Troubling ruling discourses of health: Using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in community-based research. *Critical public health*, 12(1): 17-37.

Smith, D. E. (1987)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Smith, D. E. (1990a) *The conceptual practices of power: A feminist sociology of knowledge*.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Smith, D. E. (1990b) *Texts, facts, and femininit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 of ruling*. New York: Routledge.

Smith, D. E. (1999) *Writing the social: Critique, theory and investigation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Smith, D. E. (2002)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In T. May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action* (pp. 17-52). London: Sage.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Meanings, Concepts, Methods, and Instances

Cheng-Cheng Y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he concept of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was developed by Dorothy E. Smith, a well-known feminist sociologist, who established that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ic inquiry begins from a personal everyday experience and attempts to analyze, understand, and explain social phenomena in the everyday world. As an important research method,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has become widely applied and recognized in different spheres of social science.

The goals of this paper are threefold. The first is to discuss the meanings and contributions of feminist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introduced by Smith. Second, we specifically aim to illustrate the meanings,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Finally, searching for instances of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we examine Griffith and Smith's study *Mothering for schooling*.

Keywords: Dorothy E. Smith, feminist sociology,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作者簡介

楊正誠，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研究興趣在於教育社會學、高等教育、師資培育等議題的探討，並積極於國內外研討會、學術期刊發表相關的論文。

◎〈聯絡方式〉

地址：（621）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 號 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博士班

E-mail: newwith@ms31.hinet.net